



从考古走进历史

刘庆柱◎著

寻国人之根 固国家之本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

从考古走进历史

CONG KAOGU ZOUJIN LISHI

刘庆柱◎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考古走近历史 / 刘庆柱著. —北京: 中国文史

出版社, 2018.7

(政协委员文库)

ISBN 978-7-5205-0519-2

I. ①从… II. ①刘… III. ①考古—研究—中国

IV. ① K87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4851 号

责任编辑: 蔡丹诺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地大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1.25 插页: 1

字 数: 51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政协委员文库》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家强

委 员 刘未鸣 刘 剑 韩淑芳 唐柳成 刘发升 张剑荆

主 编 刘未鸣 韩淑芳

编 辑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伟欣	于 洋	马合省	王文运	牛梦岳
卢祥秋	刘华夏	刘 夏	全秋生	孙 裕
李军政	李晓薇	张春霞	张蕊燕	杨玉珍
金 硕	赵姣娇	胡福星	高 贝	殷 旭
徐玉霞	秦千里	梁玉梅	梁 洁	程 凤
詹红旗	窦忠如	蔡丹诺	蔡晓欧	潘 飞
薛媛媛	薛未未	戴小璇		



刘庆柱（2012年）

辑一 考古学方法、理论与学术史篇

- 考古学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3
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考古学解读 / 12
构建中国考古学学科创新体系的设想 / 15
遵守学术规范, 促进考古学发展 / 20
21世纪中国考古学面临的任务 / 35
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 38

辑二 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篇

- 中原历史文化演进的考古学观察 / 45
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 81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文化 / 93
国祭也是祭国 / 97
迁安考古发现与黄帝历史文化解读 / 100
华夏历史文明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重要地位 / 104

—— 辑三 古代都城与城市篇

古代都城考古揭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 / 111

关于中国古代城址考古的思索 / 115

关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120

秦阿房宫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125

关于赵王城在中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的地位 / 131

汉长安城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礼制文化 / 136

6—7世纪中国古代都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141

古代都城研究重要性与辽上京在中国古都的地位 / 155

历史名城正定古城的再认识 / 159

关于门阙的考古学考察 / 163

—— 辑四 古代墓葬篇

中国殡葬史·总导论 / 185

秦始皇陵考古述评 / 218

西汉帝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228

大云山汉墓考古研究的几个问题 / 262

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273

陕西唐陵调查报告 / 283

陵墓若都邑：历史研究的独特视角 / 325

辑五 考古与历史研究篇

关于考古发现的“龙”之界定问题 / 331

关于古代玉器考古学研究的思考 / 341

唐代玉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345

西安相家巷遗址考古与秦封泥相关问题 / 374

关于古代莲花纹瓦当图案渊源考古研究 / 383

从曹魏都城建设与北方运河开凿看曹操的历史功绩 / 389

水下考古与古代文化交流之研究 / 403

关于姓氏研究的考古学思索 / 409

统一多民族国家视野下的中国疆域史 / 413

辑六 社会讲座篇

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 / 417

考古发现与中国历史解读 / 425

关于考古学的认知 / 435

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448

“丝绸之路”的考古学解读 / 465
古都北京与中华民族发展的考古学解读 / 484
附：专著目录 / 491
后 记 / 493



辑一

考古学方法、理论与学术史篇

考古学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一、关于私有制、国家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国家起源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之一。关于国家起源理论（即古代文明形成）的历史研究十分久远，西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中国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17—19世纪中叶，西方启蒙思想家与近代人类学家、生物学家、民族学家等，从不同学术领域进行了人类及部落、部族、家庭与国家起源问题研究，其中尤以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与摩尔根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两部巨著最为重要。达尔文《物种起源》提出的“进化论”被恩格斯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进化论、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之一。《物种起源》不只是对当时生物学影响深远，对人类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更被恩格斯指出：“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①

但是我们注意到，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在达尔文《物种起源》与摩尔根《古代社会》两部巨著诞生地的英国及美国、法国等地，一些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他们对《古代社会》一书进行了激烈批评，如人类学博厄斯学派、历史学兰克学派等，他们以历史特殊论、所谓客观主义等，对探索历史规律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2—113页。

不认同。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基于摩尔根《古代社会》所形成的关于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为完整、最为科学、最为系统的体现。这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研究，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他们提出的国家起源理论原则与研究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时代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已经明确指出^①《古代社会》的局限性，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私有制与国家起源的论断。

19世纪中叶开始，近代考古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给人类史前社会研究的大量科学材料，从而使摩尔根《古代社会》研究的“假说模式”进入近现代实证科学研究阶段。大量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得出了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学术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这一领域研究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依据民族学、人类学与生物学成果的“逻辑”推断，发展为考古学可验证的新阶段，从而使人类历史找到“源头”，能够“完整”地认识我们人类自身的“来龙去脉”，使19世纪中叶以前不为人类所知的99.75%的人类历史得以再现，作为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起点”被找到。这正如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伦福儒所说：“文化人类学家将其结论建立在与当代社群实际共同生活的体验之上，而考古学家则基本通过古代物质遗存——建筑、工具和其他人工制品，来研究过去的人类与社会。”^②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国家起源问题研究的前提是探索家庭、私有制起源。这一研究只能通过考古学对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址与墓葬的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包括其遗物所反映的工艺发展史研究，也就是科技史研究），才能取得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实证性科学结论。墓葬与遗址（主要为聚落及其中的房屋遗存）资料在研究原始社会结构发展变化与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距今18000年）发现的墓葬，与居室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墓葬在“居室”遗址之下，考古学家将其称为“居室葬”，这应

^①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页。

^② 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保罗·巴恩（Paul Bahn）著，陈淳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6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页。

该是中国最早的墓葬形式，“居室葬”也是世界范围之内最早墓葬形式。

“居室”与“居室葬”是同一人群的生者与逝者，他们是最早的社会基层“单位”，这些“社会单位”是否已经成为“家庭”，现在还处于科学研究的“假设”阶段，至于私有制更无从谈起。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前7500—前5000），以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前6300—前5700）最具典型意义。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考古发掘的349座墓葬，分布在其聚落附近，形成6个墓群，这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已经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根据新石器时代晚期（前5000—前3000）的大量考古发掘资料揭示，个体家庭与私有制这时已经出现，社会财富逐步分化，许多墓地都存在随葬品差异较大的现象。如大汶口文化（前4200—前2600）的大汶口墓地发现的133座墓葬中，55%的墓随葬陶器在5件以下或无随葬陶器，26%的墓随葬7—8件的陶器，出11—21件陶器的墓葬占13%，拥有28件以上陶器者只占6%，可知随葬陶器越多的墓，墓的数量也就越少^①，这一墓地考古发现资料反映出当时社会“富人”是少数，“穷人”是多数。

在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前2900—前2600），母权制已被父权制取代；社会分层、贫富分化进一步发展。反映母权制氏族社会特征的多人合葬墓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单人墓和个别双人男女合葬墓。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反映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彩画、陶祖、石祖等。至于这一时期的聚落与小型房屋及公共的“大房子”建筑的发现，再现了大家族内的个体小家庭之间分隔与依存的集体共居形式。

进入龙山时代（前2600—前2000），社会的“文明时代”曙光已经出现，大小不同等级聚落的形成，各地城址的发现，墓地、墓葬“差距”的加大，社会复杂化加剧，昭示着社会已经迈入“国家”的“门槛”。以陶寺文化（前2600—前2000）为例：陶寺墓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已发掘墓葬1300余座，无论从墓地大小，还是从发掘的墓葬数量来看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所罕见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墓葬严格的等级制度，鲜明地显示了贫富悬殊、地位高低有别的社会现象。成为探讨这一时期社会性质的极为珍贵的资料。从墓葬的排列情况看，陶寺墓地应有至少两个以上不同的墓区。每个墓区又可分出若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13页。

干小区，大概属一个宗族内的不同家族。整个墓地当是一个部落墓地。从墓葬形制看，有大、中、小三种，分别占墓葬总数的近1%、约10%和90%，大型墓中大多出土有鼍鼓、石磬、土鼓等特殊人物专用的属于重要礼器范畴代表社会上层权力和地位的打击乐器、仪仗武器等。大型墓主均男性。有些女性中型墓就对称分布在这些大型墓两侧，属并穴埋葬形式，应为大型墓主生前妻妾，反映了一夫多妻（妾）制，同时说明了大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之显赫，他们大概就是雄据一方的邦国首领。与之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大批的小型墓，坑穴浅小，多无木质葬具，或以席卷尸，大多数无随葬品，这些人应该属于社会底层的一般氏族成员^①。更为令人震惊的发现是人殉、人祭、人性遗存，如陕西石峁城址（距今4000年左右）的城门口道之下发现的2个奠基坑，每坑有24个人头骨，主要为年轻女性^②。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居室葬，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聚落附近墓地，再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及“万邦万国”时代，人类墓葬变化折射出社会结构、组织形态的变化，反映了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到家庭、私有制与阶级的出现。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阶级与国家是密切相连的，阶级是通过国家体现、保障其意识与利益的，这种社会活动是由“国家”完成的，国家是阶级社会“专政”载体。在“国家”起源与“专政”物化形式方面，20世纪后期至今，中国考古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国家及其专政的物化载体——都城、宫殿、礼制建筑等遗址与象征权利的各类遗物考古发现与研究，清晰地揭示出国家的“阶级性”、“政治性”，以及几千年来“国家”的“专政”形式与内容的社会形态变化。^③龙山时代的城址已经发现了几十座，“城以卫君、郭以居民”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其中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最具代表性，陶寺城址由国家政治平台的大城与宫城组成，城内发现有大型宫殿、仓储等建筑遗址，“观天授时”的“政治性”天文建筑遗址。4000年来中国古代都城的宫殿与宗庙布局变化，又反映了统治集团组成与社会形态变化的“一致性”。当大朝正殿与宗庙并列分布于都城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96页。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

③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宫城之中时，反映了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结合的国家统治集团的权利组成特色，这在夏商至东周时代的都城布局形制中的“宫庙”并列“二元”格局集中体现出来；当大朝正殿居中，宗庙与社稷分列大朝正殿东西两侧之时，反映了国家政治权利的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的国家统治集团的权利组成特色，这在秦汉至明清时代的历代王朝都城布局形制上有着十分突出的反映。

如果说以往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提出史前时代社会变化及其家庭、私有制的出现是“科学假设”的话，那么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考古学，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私有制、国家起源研究，进行了“实证性”科学研究，证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科学真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社会是从“蒙昧”、“野蛮”发展到“文明”，而马克思、恩格斯则明确提出从原始社会发展为国家的过程是从“家庭”、“私有制”到“国家”，私有制是国家产生的前提。当然，马克思也指出关于国家的“二重性”理论，即国家既是维护统治阶级或管理阶层利益的社会机器，又是执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说：“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①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彼此相互制约”研究的考古学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9页。

此相互制约。”^①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大多是局限于“人类史”范畴之内，我想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必须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否则我们的唯物史观就失去了“根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不是“自然”的“上帝”，自然是我们人类的“平台”，没有“自然”就无从谈到“人类”。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人类历史及其依存的自然历史，这是“完整”的历史。诚如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所说：就考古学的方法论而言，从考古学学科的手段与目的来说，“考古学不仅是人文学科，也是一门科学。这正是它作为一门学科的魅力所在：它兼有当代历史学家和当代科学家的独创性。”^②

马克思针对自然环境的不同而导致的人类文化差异时指出：“不同的共同体，是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发现不同的生产资料 and 不同的生活资料的。所以，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物是不同的。”^③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从“自然”，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去考察文化现象的唯物主义原则。尽管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已做出了英明的预见，但是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一直认为西方（地中海）是人类文明起源的中心。只是由于20世纪中期更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深入，考古学界先后提出了世界范围独立发展的近东（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和中南美洲（墨西哥、秘鲁）文明“三地说”，“地中海”、“中国”、“印度”与“中南美”文明“四地说”与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文明“六地说”。今天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地球村，所有成员的多种文明平等对话的科学依据，我们认为就源于现代考古学所揭示的古代世界文明存在的多样性、客观性、合理性，这就是考古学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的区域之中，考古学文化的多元性是客观存在的。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④人类生活的不同环境造就了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0页。

② 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保罗·巴恩（Paul Bahn）著，陈淳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6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